

“善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专栏

新时代参政党能力建设的体系构成

●殷啸虎

新时代参政党能力建设的体系构成，是由参政党能力建设的性质与内涵所决定的，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性质与内涵的理论化、体系化，对于深入研究和探讨参政党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参政党能力建设，是基于参政党的性质和特点，这就决定了参政党能力建设的体系构成，是围绕“参政党”展开的，即：作为政党能力的参政党能力建设和作为参政能力的参政党能力建设，两者相辅相成又各有特点，构成了新时代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完整体系。

作为政党能力的参政党能力建设

参政党作为政党，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特征。目前关于政党一般性的属性和特征的论述很多，本文不再赘述。而作为参政党，又不同于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参政党能力建设既不同于执政党能力建设，也不同于在野党能力建设，而是有着其自身独具的特点。因此，作为政党能力的参政党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决策影响能力。参政党的决策影响能力，是作为参政党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体现。它既不同于执政党的决策执行力，也不同于在野党的决策影响力，尤其是后者。在野党的决策影响力是通过对抗的方式加以实施的，而参政党的决策影响力是通过合作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因此，参政党对执政党的决策的影响力首先是保证执政党的决策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同时，参政党对决策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民主和科学，防止和避免决策的失误。

二是党际协同能力。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是合作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合作性协商、合作性监督、合作性议政。因此，同执政党之间的党际协同能力，是参政党作为政党能力的一

个重要前提。这种党际协同能力具体表现在：第一，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党际协同能力的政治前提；第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是党际协同能力的具体要求；第三，沟通协商，这是党际协同能力的具体体现。党际协同能力，说到底就是与执政党之间的沟通协商能力，通过有效规范的沟通协商，推进合作共事的实效性。

三是思想传播能力。参政党作为政党，有着自身的思想和理念，这也是参政党的价值基础。在新型政党制度之下，参政党与执政党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但同时，参政党也有着自身的思想理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参政党只有通过传播自身的思想文化理念，才能更好地动员所联系的群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凝心聚力。因此，作为政党的参政党而言，这种思想传播能力既是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宣传能力，也是对其自身所联系的党派群体的动员能力，是新时代参政党所不可或缺的能力。

作为参政能力的参政党能力建设

在新型政党制度的框架下，参政是参政党作为政党的基本职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因此，作为参政能力的参政党能力建设，要紧紧围绕参政党的性质和职能，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新型政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同时，参政党能力建设，也是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关

键，参政党能力说到底，就是一种以参政能力为核心的政党能力，因而参政党能力建设要紧扣参政能力，围绕履行参政党职能的要求，奠定履行参政党职能的能力基础。从履行参政党职能的要求出发，参政能力建设应当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第一，协商议政能力。这也是五种能力中的参政议政能力的具体体现，是参政党参与决策的主要能力体现。需要指出的是，协商议政不仅仅是听取意见，而是一种政治参与，不仅有着程序性的要求，也有着实体性的要求；不仅是政治性的，也涉及合法性。这就对参政党的协商议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提升协商议政能力，就参政党方面而言，一是要增强专业知识方面的能力，特别是要结合党派工作特点和专长，做好相关方面的知识储备，将协商议政落到实处；二是要提升调查研究的能力，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问题，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三是建议表达能力，不仅要敢于表达，还要善于表达，要把握问题的重点和关键，以理服人、取信于人，将协商的成果落到实处。

第二，民主监督能力。民主监督是参政党的重要职能，民主监督能力，是参政党的参政能力的具体体现。民主监督是在新型政党制度体制框架内的一种党际间的政治监督，是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之下，为支持、维护和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执政而进行的监督，是一种合作型而非对抗型的监督。这种监督不具有法律性，是一种政治监督，具有政治效果。

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性质，决定了对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把握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度”，也是有效发挥民主监督的前提和关键，也是参政党民主监督能力的具体体现。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度”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深度、广度、尺度、角度和力度。而参政党民主监督能力，也主要体现在对这五个“度”的把握能

力方面。

一是提高民主监督深度的能力。民主监督的深度是参政党民主监督的特色之一。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就在于它比一般的民主监督更有深度。从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实践而言，提高民主监督的深度，首先是思想理论的高度。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是领导与监督的关系，因此，这不仅是执政党善于领导、善于接受监督的问题，也是参政党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和深度正确认识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监督谁、为什么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如何强化、优化与适度监督的能力问题。

二是拓展民主监督广度的能力。参政党民主监督参与的普遍性、监督方式的多样性和监督范畴的广泛性，是拓展民主监督广度的重要方面。参政党民主监督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民主监督，监督的视野更开阔、看问题更深、更有见地，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意见和建议，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增加新的知识，集中民智民意，其超脱的地位也决定了监督的相对客观公正性。更为重要的是，参政党的成员来自社会各界，人才荟萃，既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又有各界代表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较高的智能性和相对的客观性，这就为拓展民主监督的广度奠定了基础。

三是把握民主监督尺度的能力。参政党民主监督“尺度”的把握，是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实效性的一个重要环节。尺度把握得好，效果可能就好；尺度把握不好，效果就可能差，甚至还会适得其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把握尺度的能力，可以说是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关键能力。在监督过程中，不仅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要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更要注意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之下，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保持一致，把开展民主监督与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职能有机结合，互相渗透，更

好地支持党和政府的工作。此外，民主监督要找准位置，把握好“度”，既要敢于发现问题，指出问题，又不能站在对立面，要寓监督于支持之中。

四是选择民主监督角度的能力。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对参政党民主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就包括了选择什么样的角度，更加有效地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能力问题。因此，就选择民主监督角度的能力而言，要适应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除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的监督之外，要注重围绕执政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选择社会关注、群众关心、影响较大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民主监督；要着眼于监督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不断凸显民主监督实效。尤其要加大对党政部门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决策以及有关工作情况的民主监督力度，促进党政重大决策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五是控制民主监督力度的能力。提高民主监督的深度、拓展民主监督的广度、把握民主监督的尺度、选择民主监督力度的能力。民主监督的力度控制得好，就能取得实效；控制不好，不是民主监督流于形式，就是可能产生不良的政治后果。这实际上就是协调好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之间关系的能力问题，需要参政党在开展民主监督的过程中，深入研究，不断探索。

第三，利益代表能力。参政党所联系的群体是参政党的基础，参政党的代表性，也来自这部分群体。离开了这个群体基础，参政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作为参政能力的参政党能力建设，应当提升对自身所联系群体的利益代表和表达的能力。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参政党有着其他团组织、一般性群体和个人无法比拟的严密网络和规范结构，有着严格的政治纲领和章程规定，拥有丰富的工作手段和调查渠道，具备了有效集中成员利益诉求的基础条件。参

政党可以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对各种利益诉求进行凝练，把分散性、特殊性的诉求变为一般性、综合性的要求。正如有论者指出：参政党可以通过“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直接介入利益综合过程和利益转换过程。

同时，参政党的利益代表作为一种组织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利益代表，能够使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有的放矢，有序进行，不仅可以更充分、民主地反映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愿望，避免政策制定上的偏差，而且可以缓解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四，宣传动员能力。参政党作为一个政党，其参政能力不仅是通过参政党组织的形式实现的，同时也是通过每一个参政党成员的活动实现的。如前所述，相比较而言，参政党组织与成员之间的结构相对比较松散，参政党组织发动成员履行职能、开展工作，更多的是调动成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此，作为参政能力的参政党能力建设，提升宣传动员能力、组织动员参政党成员广泛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宣传动员能力具体体现在：一方面，通过广泛的宣传动员，明确作为参政党的性质、任务以及职能，调动参政党成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参政党成员的历史传统教育，明确参政党的历史和社会责任，增强参政党成员政治参与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再一方面，搭建各种平台，广泛宣传参政党优秀成员积极参与议政政的先进事迹，发挥参政党成员模范人物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增强参政党成员政治参与的荣誉感，以政治参与与实践提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作者系民盟市委原常委，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员；本文为节选，原题题为《新时代参政党能力建设内涵、体系构成与路径》，载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文化循迹

现当代艺术还需要素描吗？

●黄阿忠

素描是显性表达图式造型的表现，在西方的绘画中有一定的训练规范；同时素描也是对客观形态的理性认识和表述，通过素描充分理解自然与空间的关系。

传统、经典的绘画和素描密切相关。而抽象、装置、行为等现当代艺术不需要有精准的造型能力，素描所塑造的空间、表现的质感也并不重要。从法国艺术家杜尚把便器颠倒放置在美术馆，并说人人都可以做艺术家开始，就已经把素描基础和基本的造型能力给抛弃了。

当下，这个曾在艺术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素描是否还被需要呢？

素描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才走到今天。它的源头在古埃及、古希腊，甚至可以往前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人在石壁上、岩石上用线刻下与人类相关的飞禽、走兽、奔跑、放牧、狩猎等造型、图式，或许这是最早的“素描”。

素描最初的功能是为宗教服务，在教堂壁画画成时，用铅笔、炭条起稿，打轮廓，后来渐渐发展成可以单独成作品的素描。文艺复兴时期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高手，研究透视、空间、塑造等，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去进行素描，为艺术创造了质朴、清新、庄严、厚重的审美境界。

当素描摆脱以往所谓的打轮廓、作为绘画的依托后，单独的素描逐渐形成。作为独立意义的“素描”，形式是多样的。我见过达·芬奇画的发明设计小稿，这种用铅笔勾写在纸上图案，有造型、明暗、线条，那是一种素描；米开朗基罗画“创世纪”天顶画时也有小稿，或者是在大理石上凿大卫、基督受难等雕塑，都有设计草图，我认为也可以作为素描成立。

阿道夫·门采尔是天才的素描能手，以《轧钢厂》为例，那生动的线条、精准的解剖、还有营造的气氛，是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还有普希金古典主义的用笔方式、细节表现，造型优美、别致独特，其素描人物神态生动传神，能精准捕捉营造画面流动感，使静态素描充满内在生命力，体现巴洛克风格的宏伟与激情；伦勃朗的素描厚重，他用明暗法表现的光富有神韵，其素描逐渐扩大了对空间、人物、场景的描绘范围，那些细部的表现令人叫绝，特别是风景素描，包括铜版画，更具有高贵气息；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的素描规范、强化线条，在作品中着眼于线和素描关系的悉心研究，他认为素描是真正的艺术；而珂勒惠支是一个以素描形式创作的艺术家，她关注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其素描单纯、坚韧、精炼，有个性、有情感，激情澎湃，创造出独特的形式语言，在世界素描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世纪开始，素描扩大表现日常的生活场

景。随着绘画历史发展，各种流派，形式，风格多变，都没离开过素描。浪漫主义的德拉克洛瓦，表现主义的蒙克等画家，他们塑造物体从严谨的表现到放松的写意，素描是基本的支撑；印象派画家莫奈、毕沙罗描绘的光，米勒的带着情感的《拾穗者》，是另一种形式的素描；立体派画家毕加索、勃拉克的立体组合，都是有风格、形式的素描；柯罗、安德斯·佐恩、马蒂斯、费钦的素描，有着强烈的个性表达；席勒16岁画的素描、速写，显示了他的天才；纳比派、野兽派，包括克林姆特创立的维也纳分离派，他们的素描主张打破传统学院派的束缚，强调艺术自由与创新，也都带上时代烙印。

随着时代发展，素描不断扩大样式、风格，现当代艺术成为世界艺术的主流，素描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日本浮土绘对于西方绘画的影响，逐渐改变对素描的认识，东方的美学、禅宗艺术、土著艺术、少数民族纯粹的情感融入线条、块面，使素描又重新溯回源头，岩画、壁画等艺术表现形式赋予素描新的意义。

在东方，中国的艺术和素描早就结缘。中国早期的“素描”是线，以线的疏密扩展为一幅幅图画。西汉时期出现的线描壁画，在壁画中以线条勾勒手法表现人物、景物，这和西班牙、法国洞穴壁画极为相似。北魏、唐、五代时期在绢、纸上广泛应用的是线，并逐渐形成以书法线条为特色的水墨素描体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求像与不像、准与不准，心中所求的，是意象，是气韵生动。所谓素描已扩展到玄学、禅学、审美认知、东方美学等，我们从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和中国雕塑的区别上能看到。

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将西方素描带入，逐步引进素描课程，包括人体写生等，让素描有了新的天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关良等去欧、美、日本留学，学成归来传播西方艺术，素描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也慢慢和中国绘画与审美融合。上世纪70年代，素描在中国蓬勃兴起，沪上素描，速写研习热情高涨，西画教学出现崭新面貌。素描作为基础绘画训练的一种图式，也慢慢把素描纳入独立、独幅的模式。这个时段，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素描人才，沿承西方的素描在中国开出一朵朵鲜花。

素描发展一路过来，并还在继续。我以为它与现当代艺术仍有密切关联，不过是改变了面孔和理念与我们相遇罢了。现当代艺术包括装置、行为、抽象等艺术，已把“素描”上升到“道”的层面，不再用狭隘定义去匡待它。这样一来，整个绘画、艺术，都可归结为泛指一切的“大素描”。素描发展至今，慢慢扩大其属性，扩大在艺术中的形象设计理念作用，变

成密码隐身。

素描是造型能力的体现，素描是美学思想最先的注入，我们要承认素描的多种表现，有时它们不在传统的范畴。比如丁乙作品是单点的线的交错，其线的长度、宽度等设计方法应是新形式的素描；比如徐冰创造的“汉字”，其改变的点画也可作为素描的一种，乃至它的悬挂方式、高低、宽窄、弧度、长短的设计，那种视觉不也是素描吗？再比如李向阳的“线场”构成、曲丰国的“彩线”排列，寻根溯源，还是随循素描最基本的“三笔摆成大关系”的基础要求；胡项城的装置把老建筑的零部件重新组装，组合的依据是大小、疏密、节奏等视觉，最终没有离开素描给予的美学理念；陈箴的装置《圆桌会议》，视觉上也是素描，其“草图”上画的点、线和形象，还有文字，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素描”作品；赵无极的抽象表现浩瀚的太空，那一团团、一丝丝的组合，也是有造型的，没有素描的认知是不行的；朱德群的抽象，我以为就是中国山水画的重新组建，这画中的素描感觉非常重要。

现当代的素描是从观察、分析、认知和图式意义去研究建立的。素描的造型意识从写生中获得感悟、灵智和营造审美情趣。线条是点在散步，大点、小点汇聚成面，是情绪的表述释放，点、线、面的组合是诗性的创造。素描的美不在于对自然的机械复制，而在于艺术家通过线条表达观念和意图，体现了艺术家对世界的观察、重构和情绪的表达。

卡夫卡在评论素描时，间接表达了对中国道家学说的共鸣。他欣赏素描中“虚实观”的运用，认为真正的艺术源于心灵的纯粹，这与道家“清”“纯”“真”的理念契合。素描的留白与简练线条，被他视为接近非现实本质的途径。卡夫卡认为素描能够捕捉人的内在轮廓，作为心灵的直接表达，而非仅仅依赖外部的透视。

尼采认为素描不仅是技术展示，更是艺术家情感的直接记录。素描是一种感觉，是眼睛与心与手之间的关系，是空间距离与时间的关系。贡布里希强调艺术创作源于明确任务或观念，素描作为起点需聚焦形式问题。他主张艺术家应通过素描探索“形式”而非单纯模仿题材，这与现代艺术中“形式第一”的倾向一致，素描成为检验观念的工具。

从西方文艺复兴到现当代艺术，素描从注重写实转向探索形式潜能；素描的想象力、主观感受，在此过程中成为观念变革的载体。不管艺术如何改变形式，素描作为一种审美应始终贯穿其创作过程。

（作者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导）

建言献策

构建多维功能体系 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动态适应性

●尧金仁

十二届市委八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充分发挥“五个中心”建设的“先手棋”作用，更好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可见，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和地缘政治动荡交织的背景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但影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重构，而且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

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这些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需要寻找发力重点，拓展对外链接，发挥在促进资本流动、技术创新和社会包容中的关键作用，加快从“交易中心”向“创新枢纽”转型。为此，上海应超越传统金融业务的局限，构建多维功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动态适应性，应对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挑战。

科技金融引擎。推动资本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种子期以天使投资驱动技术研发，初期以风险投资推动技术支持，成长期以私募投资支持技术产业化，成熟期以银行信贷助力长足发展，形成“研发—融资—产业化”闭环。关注技术创新的伦理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平衡创新与技术，防范算法偏见、数据垄断和社会排斥，促进更广泛的创新。

风险共担网络。以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为例，再保险市场要对高保额、高风险产业发挥稳定器作用，形成“保险+科技+风险管理”的跨境风险分散体系，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对全球性风险的韧性和在全球危机中的抗冲击能力。风险共担网络具有很强 的社会价值，在微观层面可通过社区参与提升风险意识，通过保险产品创新保障民生，增强整体社会的韧性。

国资改革平台。通过证券化提升国资流动性，促进治理结构优化，完善“管资本”导向的国资国企改革模式，优化国资配置效率，释放存量资本活力。在国资进一步改革的过程中，要考虑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通过对冲工具管理汇率风险。国企在海外上市过程中，可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降低传统路径依赖，同时强化本土市场基础。

普惠金融桥梁。通过数字化工具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提升普惠金融的可及性，促

进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增长。整合社区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构建多层次服务体系，确保资源精准滴灌至弱势群体。跟踪研究、评估普惠金融的长期效益，确保资源投入产生实际社会回报。完善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普惠金融产品融资增信、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力度。

数字金融枢纽。以临港新片区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为样板，探索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构建全球协作的金融生态，提升中国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研究数字主权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影响，通过数字主权管理，平衡开放与安全，确保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数字时代保持领先优势。改变以交易规模为核心的评估标准，转向“功能适配性”与“生态包容性”。

离岸在岸融合。离岸与在岸共同发展是纽约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显著特征。相比之下，上海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尚未成形，境外企业和“走出去”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无法有效满足。推动离岸与在岸市场规则融合，与全球治理趋势同步，使其更具全球适用性和文化包容性。建立跨境监管协调平台，在确保规则一致的同时防范套利风险。

文化底蘊支撑。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纳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培育风险底线意识、长期主义价值观与理性投资氛围。结合儒家诚信理念，借鉴瑞士的稳健金融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信任体系，提升国际声誉与公信力，吸引全球合作伙伴。推广“负责任投资”文化，强化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意识，确保金融活动服务于长远社会目标。通过公众参与和多元协商，确保规则变革反映多元利益。

制度规则引领。制度型开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升级的核心动力，制度稳定与市场信任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要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治理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企业走向国际、对接先进治理标准提供支撑。彻底转变管理思维，从“行政管理”转向“服务赋能”。在制度层面引入未来学视角，预测技术变革对制度的影响，确保制度演进与技术进步同步。

（作者系民盟市委原常委、保险总支主委，太平人寿上海自贸区分公司副总经理）